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8 期・頁 167-172・2018
DOI:10.6152/jaa.2018.6.00011

圖示式金融權力運作之外的主體、情感和慾望：回應徐進鈺教授的評論

鄭 瑋 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感謝徐進鈺教授的評論與提問。以下，我將徐教授對於本人研究論文以及導論的提問，分別進行回應。

（一）對〈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提問之回應

徐教授的第一個提問是：「這些主體的位置以及慾望，或者他所形成的這個空間，是目前一些金融機構或者國家無法介入的一些空間及位置？若是如此，這些空間是否就是逃逸的空間？或者是說，金融化雖然可以影響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極度金融化的同時，人的慾望與情感還是可以提供對抗的空間？」這個解讀相當程度上貼近我的本意，但請容我從金融資本主義權力運作的特性來闡明「逃逸空間」的性質。這一點必須透過金融化的權力運作性質來加以理解。與其說這些分裂主體的情感或慾望，是金融機構或國家所無法介入的空間，我傾向於指出，那些是金融資本主義這部機器特有的圖示式（diagrammatic）權力運作所忽視的面向。圖式指涉了構成權力的力量間關係（relations between forces）之陳列，是力量關係與強度的地圖，正因為力量是微物理學的、策略的、多點的且發散的，在地圖上的每一瞬間會穿越每一個點，或是在每一個關係中，由某一點穿越至另一點。就此而言，圖式是以共同延展於整體社會場域之非一致化的內在原因來運作：抽象機器就像是那些執行其關係之具體組裝的原因，力量關係會發生在具體組裝的紋理組織之內，而非之上（Deleuze 1988: 33-37）。除了分析資本如何以圖示方式去動員象徵符號與分裂主體之外，我的論文更探究了當地人如何面對處理那未被金融資本的權力所動員的的關係主體與象徵符號，進而觸碰到人性與存在中無可名狀的層面。我認為，目前學界有關主體化生產的理論，並未深刻且實質地掌握，那些不受到無意至符號學所影響或激發的當代經濟主體性以及人的存在之域，特別是有關分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體的存在性、情感強度、所欲的關係以及個人慾望。[1]

接著，徐教授問道：前述不被金融機構與國家宰制空間的存在，是否與 Polanyi 所提到的 double movement，有所呼應？就我的理解，Polanyi 提出雙重運動作為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的內在張力，即，在社會與市場二分的前提下，人做為社會存有既容許了勞動力的商品化以促成資本積累（市場社會），但社會整體會創造出各種去商品化的制度做為社會保護，以抵抗人的全面商品化（Polanyi 1957）。就此，經濟過程是在市場化與社會化這兩股力量的辯證中進行。我的論文並不特別與 Polanyi 對話，最主要原因在於，我認為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與市場間的關係，遠比 Polanyi 所認識到的更為複雜。由本論文集的研究成果來看，新自由主義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市場邏輯成為社會重新組織其自身運作的憑藉，自成一格的社會更因著社會分類的模糊化，而難以再被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其次，新自由主義國家與人民理所當然地將市場及其所牽連的人觀與主體形象，當成組織其生活的依據。對國家與個人而言，市場邏輯不再是社會的對立面，市場邏輯甚至滲透到社會生活與政府的運作之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化的經濟過程，特別是金融化（或市場邏輯）的運作，並非建立在 Polanyi 主張的市場與社會的辯證這種雙重運動之上，而是透過主體性的生產來進行。進一步而言，主體性與市場邏輯之間並不是透過辯證關係來互動，因為將二者間互動定性為辯證關係，預設了經濟過程將無可避免地依循某種一致化邏輯來運作。相反地，我所辨識出的主體性與金融化之間的關係，既有因為金融資本的主體化機制所造就的後果，同時因為個人身處之脈絡而牽動了不同的邏輯（如金融資本與個人關係、制度理性與關係情感、勞動與個人友誼、家與親屬和地下金融、情緒勞動者與內在自我），形成了不同分裂主體之間或對立衝突、或交替出現、或相互結合的情況，展現出異質性及多向性。在這個意義下，我認為主體的情感和慾望之於市場間的關係，並不只存在著「對抗」這種關係，而是更為複雜的糾葛。

（二）對〈導論〉提問的回應

首先，有關以空間化的主體做為掌握金融化經驗的差異過程及其變動性的關鍵這個思考進路。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徐教授所言，對於金融化之下的主體經驗與主體建構的掌握，必須考量主體所在的社會經濟空間來加以脈絡化。然而，就本論文及收錄的魯凱個案研究而言，當地居民在金融化下的主體經驗與主體建構，所涉及的空間性質乃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多向度空間：居住在聚落內，但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與不同尺度空間的經濟力量互動（如彈性勞動、金融機構、關係金融），更重要地，在特定事件中，個人往往會在不同主體位置之間的滑動，讓不同尺度的經濟力量或經濟邏輯，意外地產生碰撞或相互結合，交替出現，乃至彼此衝突。我的淺見是：若「空間化的主體」要對於主體建構是具顯著意義的切入點，研究者至少必須處理「空間在金融化之前與之下的性質究竟產生了怎樣的轉變」這個議題，特別是，資本與時間對於空間性質的轉變，究竟帶來了怎樣的作用與後果。我認為，只有在意識到當地人所生活的當代空間是多向度的空間（黃應貴2016），我們才能確實掌握：在涵融了資本與時間所展現的當代空間中，人因著金融資本主義這部機器的運作，成為分裂的主體。這些分裂主體結合了各種無意指符號而運作，展現其金融主體性。與此同時，那些經歷分裂過程所遺下的部分主體，他們的心緒、情感和慾望，指引或支撐了其在金融化過程中確立自身存在的意義。事實上，從資本循環的角度來看，金融資本主義的運作與繁衍，一方面必須透過地理空間中擴張與快速循環時間，以確保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必須透過資本主義這個機器來不斷生產分裂主體，並與金融符號結合，促成機器能有效運作。正因為金融化同時涉及了結構化力量與主體性生產這兩個面向，其運作過程引入了政府對市場的治理、金融市場的邏輯、地方社會的歷史性以及主體化模式等力量，彼此交錯、糾結，才導致不同地理空間區位中，出現了獨特的金融化運作、擴張或受挫的樣態。若要在金融化下討論空間與主體間的關係，我傾向從資本進入的時間流，來掌握空間性質分殊化（物理、社會、文化、想像、無視各種尺度限制而跳接的虛擬空間；空間做為條件、做為結構化力量、做為關係、做為主體認識自身處境的參照、做為再現的形式），以及多重主體生產模式（作為親屬主體、個人主義式認同的生產機制、社會順從、機器式臣屬），如何在具體事件中，因著人與人的互動而加以結合、運作而產生面貌各異的後果，以呈現出金融化過程的獨特性。

第二，有關研究者該如何對金融化進行道德價值評價的提問。讓我從人的解放以及對資本近用的有無這兩個角度，來回應有關如何對與金融化道德價值判斷這個問題。首先，資本主義的確立與擴張，一開始就仰賴執政者的法律與暴力，將農奴從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以創造出僅擁有自己身體這項財產的個人，這個自由人為了維生，不得不販賣勞動力，接受資本家的支配，然而獨立自主的個人既是資本家剝削的對象，卻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對照之下，封建制度中的農奴的確受到社會保護，但那是建立在封建制度不承認農奴擁有人身自由的基礎上。就此而言，在經濟社會結構鉅變的時代中，人從舊制度中解放出來，是無庸置疑的，問題在於：解放之後的人，在新的經濟社會安排中，究竟面臨了怎樣存在處境？從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群系列叢書出版以來，透過每一次對新課題的探究，企圖指出：新自由主義化將人從現代性秩序中解放出來，意味著破碎的多重人觀的出現，這個人觀的出現，有其歷史性與時代意義。伴隨著資本主義而出現的現代性個體人，意味人不再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所形成的鏡我來認識自己，而這種現代性的個體人，往往透過消費主義來認識自我的意義，結果卻是多重破碎的自我，導致內心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這使得「我是誰？」成為當代極為嚴峻的存在課題。至少，從當代宗教研究中，我們看到人透過重新與他人建立關係的關係性存有來面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本論文集不僅呈現了金融資本主義下的主體化模式及其後果，更進一步以個案處理了「經濟人」這個當代最重要的主體形象，如何成為那些從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的人進行自我主體化的基礎。甚至，人的解放過程，不只要針對既有制度加諸於他們的限制—「對抗」的概念不必然能準確掌握此一解放過程的性質，因為某些舊社會的價值反而被當代的人重新渴望，而這種看似復古的新的渴望，往往是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

其次，若從對資本近用（access）的有無這個角度來看，債務經濟的本質是債權人與債務者間永恆的不平等關係，欠債者這種經濟主體的形塑，當然同時包含了無資本者經由一連串的評估過程與重塑記憶來取得一種使得得以擺脫目前困境的債務資本，這是以特定期限內的生活重整與規範慾望作為獲取金融資產的自由。正因如此，當代資本主義乃是生產主體性的經濟（Lazzarato 2012）。至於因金融自由化而獲取貸款這類債務資本的人，是否在某虛幻宣稱下被賦權？至少，我並不會將個人以債務來實現個人希望的行動，編派為虛假意識的作用。毋寧說，債務經濟作為資本的當代形式，必須視為關係，因此，捲入債務經濟的人，即是進入一種特殊的經濟關係之中。其間，個人主觀想法的詮釋與評價，必須放在債務作為一種不平等關係的框架中來加以掌握。正是因為將資本視為關係，本論文集同時關注的是無資本者進入債務經濟的過程、主體經驗及其面對的結構性力量，同時呈現他們所面臨的壓迫以及存在心緒和處境。對此，本論文集對於欠債者與金融資本間的整體關係，並不是只從順服或抵抗這兩個角度來探究，而是全面地考量了事件與情境中的人的獨特關懷、情感與慾望，以求適切詮釋其行動的意義。

徐教授的第三個提問是：採取批判進路或社會實踐立場的人，是否能從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自行攫取部分有用的技術，再加以重新組裝成一套能夠踐行其改革現況的技術，進而達成反制新自由主義化的意圖？

這個提問必須從新自由主義究竟是一套新的治理技術抑或是資本積累的新方式來加以回應。若我們同意傅柯，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套新的治理技術時，這些治理技術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政府重新對國家、社會與市場三者間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之後，為了達成該目標而被引入以成為整體治理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個別的治理技術並非由一套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知識所生產的，其被納為治理所用，只是因為其被認識為是具有達成有關市場競爭、適合進行分類、排序、評量等理性化目標，眾多技術原只是鬆散地接合，而非鐵板一塊，當然可以將之從另一個脈絡中拆解出來，再加以挪用、重組、甚至導向反制新自由主義治理性的後果。不過，我們也要問，將這些治理技術加以去政治，是否就是對這些技術的準確定性？對於技術的去政治性，是否只是某種技術樂觀主義的論述？若將技術與人同樣視為行動體（actant），挪用技術以達成反制新自由主義化的意圖，是否會在新的組裝網絡中被踐行出來？至少，從我對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粗淺認識，人與非人行動體彼此協作、行動的後果，並不取決於任何事先預定的意圖，而是整體網絡運作的結果。即是我們接受了對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去政治化的立場，那麼，將技術視為與人同等地位的行動體，是否真能達成我們意圖在新的脈絡中，將技術再政治化，以達成反制新自由主義的目的？

甚至必須問的是：若金融化或新自由主義化不只是一套治理技術？

如果金融化是關乎資本尋找新的積累模式，更是一套關乎生產主體性的經濟安排，那麼，正如導論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主體化模式，成功地動用了個人無意識，使得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踐行了各項金融實踐，並視為理所當然。就此，個人無意識就成了我們該如何在新自由主義中尋找出路之政治計畫（political project）的關鍵所在（Guattari 1979; Lazzarato 2012, 2014）。從義大利工人自主運動出身的哲學家們（如 Lazzarato、Berardi），清楚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對日常生活與主體建構的全面滲透，使得傳統左派倡議以階級為基礎的革命政治，更加遙不可及。至少，所謂的新政治想像與政治計畫，不能再以單純的對抗這類革命政治的想法來理解，更無法不去討論主體性轉變的問題（Lazzarato 2017）。

附　註

1.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這些分裂主體並不等同於（以個體人為基礎的）現代性主體，因為現代性主體係經由單一認同的社會主體化機制而出現，但該機制在當代不再具有支配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黃應貴

2015 〈導論：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及社會想像〉。刊於《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編，頁 1-45。台北：群學。

Deleuze, Gilles

1988 Foucault. Sean Hand, trans. London: Continuum.

Guattari, Felix

1979 The Machinic Unconscious: Essays in Schizoanalysis. Taylor Adkins,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Lazzarato, Maurizio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Joshua David Jordan, trans. Los Angles: Semiotext(e).

2014 Signs and Machines. Joshua David Jordan, trans. Los Angles: Semiotext(e).

2017 Experimental Politics: Work, Welfare, and Creativity in the Neoliberal Age. Arianna Bove, Jeremy Gilbert, Andrew Goffey, Mark Hayward, Jason Read, and Alberto Toscano,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